

文化智商:厚植文化自信的新视角

王 嘉

摘 要 文化智商是衡量文化主体适应并融入多元文化环境能力的指标;文化智商的提升能够完善文化主体的心理构建,全面提高文化主体能力,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升和预测文化主体的文化自信水平,最终推动文化自信由理论探究付诸具体实践活动;通过提升文化智商来厚植文化自信,可以从开展通识教育、完善心理构建和加强文明互鉴三种具体路径入手,分别提升精神性、动机性和行为性文化智商,进而涵养、激发和坚定文化主体的文化自信。

关键词 文化智商;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18)06-0014-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5BKS10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DUT18RW508)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民族或政党等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理想和文化价值的高度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高度信心,并相信自身文化能够激励本民族、社会和国家不断前行”^[1](P6)。文化自信作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2](P25),是“三个自信”形成的重要基石。自2016年习近平首次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提出后,学术界关于文化自信以及“四个自信”的相关研究呈井喷态势。目前,学术界关于文化自信的探讨更多地集中在“文化自卑—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生成逻辑研究、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研究、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的地位与功能研究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等方面,较为系统地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源起、内涵、价值与路径。但对于文化自信理论如何更好地落实到文化实践主体,即人民群众的文化实践活动之中,使人民群众如何能够在多元开放的文化交流碰撞中保持比较优势、具备较高的文化定力等关乎文化自信的生命力以及未来发展的问题却关涉较少。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国际背景下,不同文明间的交流日趋常态化,在多样文明相互激荡、多种思潮暗涌迭起的环境中,文化主体如何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认识文化差异,并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中保持比较优势、坚定自身文化立场,成为厚植文化自信过程中更为重要的问题。文化智商作为衡量文化主体融入多元文化环境以实现跨文化目标的能力指标,已经较为广泛地应用于多元文化交流活动。提升我国文化主体的文化智商,既能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形成提供能力保障,又有利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因此,将文化智商作为厚植文化自信的新视角,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文化自信研究的主要路向

文化自信的相关研究作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研究的热点主要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系统梳理了文化自信理论的生成脉络、内涵意蕴与本质特征,辨析文化自信的时代价值及其在“四个自信”中的地位与作用。学术界从文化自信的学理研究出发,通过厘清文化、文化自卑、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等概念,指出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生成的前提条件,文化自信是文化自觉发展到高级阶段

不可抑制的主体心理涌现的逻辑脉络^[3],从而阐明文化自信的理论生成机制。从文化主客体互动、价值观、经济全球化等角度探讨文化自信的基本内涵,从而揭示文化自信具有的本源性、主体性、指向性、认同性、包容性及实践性等本质特征。文化自信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抓手,是实现伟大梦想的重要保证,是走好新征程的精神动力,是保持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深厚基石。文化自信作为道路自信的精神滋养、理论自信的深厚根基、制度自信的不竭源泉,是“四个自信”中更为基础的自信。同时,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承载,分析文化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时代价值。

其次,具体阐释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论述文化自信内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者的内涵及其关系。文化自信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其最深层的力量源泉必定蕴藏于社会生产生活的过程中,受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约。此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科学指引、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及日益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等都奠定了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习近平指出,“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4]。由此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是文化自信的来源又是其主要内容。学术界在具体阐释三种文化内涵的基础上,论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化自信的根基^[5],是提振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中国革命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承接,承载红色基因,是文化自信的精神支柱^[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昭示了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是文化自信的重要实践支撑。

再次,深刻揭示新时代条件下文化自信面临的现实困境。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文化自信显著提升。在抓住时代机遇的同时,学者们也清晰地意识到提振文化自信所面对的现实困境。由于我国尚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体上还没有完全扭转“西强我弱”的局面,因此,中华文化在国际社会话语权的实现受到西方文化的制约与限制。随着网络新媒体逐渐深入文化生活领域,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的呈现方式,给文化自信的提振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的文化需求也逐渐多样化、品质化,对文化本身的发展提出更高要求,也使提振文化自信更加困难。

最后,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重点,探究提振文化自信的路径与方法。学术界在探寻厚植文化自信路径的过程中,更多地将从体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提振文化自信的重要路径,旨在完善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本质的理解、提升文化主体的内在认同,希冀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寻找到提振文化自信的出路。此外,研究者还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制与产业建设、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等多个角度论证提振文化自信的路径与方法。

上述研究为提振文化自信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是本文研究的基础。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不断深化,现有的理论研究逐渐难以满足新时代厚植文化自信的需求,其研究路向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转变:一是由文化自信的内涵研究向文化主体实践研究转变。文化实践主体不仅是文化的创造者,更是文化自信的彰显者,文化自信只有在文化主体的实践中才能得以检验、发展与彰显。二是由文化主体的认知研究向其心理构建研究转变。现有的研究主要以文化主体对文化自信内容的认知与承创来提振文化自信,更多地还停留在文化自觉层面,应将研究重点由自身文化系统本身转向拓展自身文化的影响力与感染力。自信作为主体内在的心理状态,本身就属于心理学的研究范畴。新时期进一步厚植文化自信,不但应从文化内容着手,更应重视文化主体的心理构建。三是由探寻传统向文明互鉴转变。目前,关于提振文化自信路径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体认与承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有学者将文明交流互鉴作为提升文化自信的路径,但其论述仅停留于宏观层面,并未做具体探究。由此可见,目前关于提振文化自信的思路最终指向是对内的,是以探寻文化本源为目的的,重点在于使文化主体在认识到

自身所处的母文化“是什么”“从哪来”的基础上,提升自身文化自信。然而,文化主体的文化自信不应仅局限于对自身文化历史与传统的科学认识,更应关注文化的未来发展,即解决自身文化“到哪去”“怎么去”的问题,这是提振文化自信过程中更为重要的问题。文化智商理论作为全面系统衡量主体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指标,可以从提升文化主体的文化认知、文化动机以及文化交流能力等微观角度入手,推动文化自信研究以上三个方面的转变,进而更好地厚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二、文化智商的理论界定

文化智商(CQ)作为一种商学概念已被《剑桥商学研究手册》^①收录,与智商(IQ)、情商(EQ)等概念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7](P38)。国外学者同时使用 Cultural Intelligence 和 Cultural Quotient 两种表达,前者倾向于能力层面,后者则注重对能力的系统测评。能力是一种达到要求的最低限度^[8](P72),而文化智商作为一种系统、动态的衡量指标,是对能力概念的超越。因此,国外有关文化智商著述的标题虽然同时使用 Cultural Intelligence 和 Cultural Quotient(CQ),但是对文化智商的概念、测量及多领域应用等具体论述皆是基于 CQ 展开的,以凸显其商学本质。因此,本文将其译为文化智商,而不是文化智力或文化能力。文化智商与智商和情商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面对新的文化环境,文化智商和智商都会使人“三思而行”,即人们在进入新的环境时往往会以降低行事效率来适应新的环境,文化智商和智商较高的群体往往能够缩短这一过程。文化智商与智商最大的区别在于其更关注个体识别与适应新的文化环境的能力。情商和文化智商均在情绪管理领域超越了智商。然而,文化智商不同于情商,它侧重于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感知和管理情绪的能力,而不是一般的管理情绪的能力。

1. 文化智商的概念。伦敦管理学院克里斯托弗·厄尔利(P. C. Earley)教授和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洪信(Soon Ang)教授借鉴了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J. Sternberg)和道格拉斯·德特曼(Douglas K. Detterman)的多维度智商观点,于2003年最早明确提出“文化智商”的概念模型,指出,文化智商是人们在异质文化环境中收集、处理文化信息并据此做出文化判断与行为选择,以便更好适应多元文化环境的能力^[9](P59-70)。当前,关于文化智商的概念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克里斯托弗·厄尔利与马林诺夫斯基(E. Mosakowski)从商业管理角度出发,认为文化智商是企业管理者灵活处理文化差异、协调跨文化团队建设、高效开展跨文化业务的能力^[10](P139-146);布鲁克斯·彼得森(Brooks Peterson)借助平等和阶层制度、直接和间接、个人和群体、任务和人际关系以及风险和谨慎这五种文化标尺,为跨文化交流者了解不同文化提供操作性建议;戴维·托马斯(David C. Thomas)认为,文化智商是个体在跨文化情境中所具备的文化知识底蕴、文化环境体验以及文化行为转变的异质文化适应能力^[11](P78-79)。由此可见,学者们虽从不同角度对文化智商的概念进行界定,但究其本质是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文化智商应界定为衡量文化主体适应并融入多元文化环境能力的指标。理解文化智商,应着重把握以下两个要点:一方面,文化主体适应并融入多元文化环境并不意味着其完全否定自己的文化立场。认同本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是跨文化交流的基本前提,文化主体在多元文化交流过程中调整自己的外在行为与方式,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消除文化差异带来的阻碍,进而更好地实现自身的目的;另一方面,文化主体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为了适应不同文化环境所作出的调整,大多具有较强的目的性。跨国企业管理者往往通过成功的跨文化实践活动,实现对其企业的有效管理^[12](P101-112);国际留学生往往通过成功的跨文化实践活动,习得更多的有用知识。

2. 文化智商的结构。文化智商的内在逻辑结构分析与建构是对文化智商概念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是文化智商测量与提升的关键。研究伊始,克里斯托弗·厄尔利和洪信认为文化智商由认知性、动机性和行

① 《剑桥商学研究手册》(Cambridge Handbook of Intelligence),由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罗伯特·斯滕伯格及纽约大学心理学教授斯科特·巴里考夫曼(Scott Barry Kaufman)共同编著。该书涵盖了人类商学领域最新、最全面的研究成果。全书42章内容均由相关领域的世界知名专家撰写,被文化智商研究中心(CQC)誉为“商”学领域的权威著作。

为性三个因素建构而成^[13] (P42-82)。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两位学者为使该结构顺承以往有关智商理论的研究框架,提出了包括元认知性文化智商、认知性文化智商、动机性文化智商以及行为性文化智商在内的四因素结构模式,这种四因素结构模式在文化智商研究领域的应用较为广泛。元认知性文化智商和认知性文化智商统称为精神性文化智商。元认知性文化智商是指个体在与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时所具有的敏锐的文化感知力。拥有较高元认知性文化智商的个体往往更易于发掘与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进行交流时需注意的一些潜在规则,自觉调整自身的文化知识与行为方式,将看似错杂、模糊的跨文化环境梳理得更为清晰。认知性文化智商是指个体对多元文化环境中的行为规范、传统风俗、核心价值等信息进行接收和处理的能力。具有高认知性文化智商的个体通常更善于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经济、政治及社会制度,更乐于比较不同文化间的异同。动机性文化智商反映的是个体学习与适应不同文化的内驱性与积极性。动机性文化智商是跨文化交流驱动力的来源,高动机性文化智商的个体往往对充满挑战的异域文化充满好奇,高度的自我效能感使其坚信自己能够克服跨文化环境中的种种障碍。行为性文化智商是指个体运用语言与非语言等手段进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高行为性文化智商的个体通常能够在科学的文化认知基础上,表现出恰当的文化行为,顺利实现跨文化目的。

3. 文化智商的测量。基于文化智商三因素结构与四因素结构,文化智商测量相应地分为两种典型模式。克里斯托弗·厄尔利和马林诺夫斯基根据文化智商的三因素结构设计了文化智商测量表,由认知、动机和行为三个分量表构成,采用李克特五分等级量表进行分级评价。根据被调查者在每个部分的得分情况,将个体文化智商分为6种典型类型即偏激型、分析型、天生型、大使型、模仿型及变色龙型。其中,变色龙型是极为难得的跨文化管理人才,这一类型的人能够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灵活处理各种问题并能够迅速融入其中。洪信和戴文林等人根据文化智商的四因素结构开发了一份文化智商测量表(CQS)。该量表在对具有丰富跨文化交流经验的8名国际经理人进行访谈的基础上,确定了20道测试题目,从文化智商元认知、认知、动机以及行为四个方面进行考量,经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商学院、美国中西部高校等超过1600名高校学生实证检验,表现出对个体跨文化交流具有较好的预测性^[14] (P16-38)。香农(Lu. M. Shannon)和托马斯·贝格利(Thomas M. Begley)使用该量表进行文化智商的自我测评(Self-report)与同行测评(Observer-report),其结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进一步说明了该量表的科学性^[15] (P41-55)。目前,文化智商测量的样本主要集中于学生和跨文化企业管理者。

三、提升文化智商对厚植文化自信的作用

文化智商的提高不仅能够提升文化主体的文化感知能力、文化适应能力与文化交流能力,为文化自信的形成提供保障,而且能够在增强文化主体文化自豪感与文化包容性的过程中,为文化自信的激发提供心理支撑。此外,文化智商的可测量性能够为文化自信的提升提供科学考量。由此可见,提升文化智商之于厚植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文化智商的提升能够为文化自信的形成提供多方面的能力保障

首先,提升文化智商能够提高文化主体的文化感知能力,在体味多元文化中夯实文化自信的认知基础。文化主体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能否及时感知文化间的差异,是跨文化交流成败的关键。具有较高的元认知性文化智商使文化主体在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互动时,具有敏锐的文化感知力,能够及时捕捉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自觉调整自身的行为从而减少由文化间的差异所带来的各种阻碍。高文化感知力的主体不仅能够迅速转变自己的行为模式以适应文化差异,而且能够通过元认知能力的迁移更为深入地理解不同文化的本质。因此,文化智商的提高能够提升文化主体的文化感知能力,使其能在充分感知多样文化的基础上,更为从容地应对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阻碍,夯实文化自信的认知基础。

其次,提升文化智商能够提高主体的跨文化适应能力,在克服差异中增进文化自信。跨文化适应主要指文化主体在感知多元文化差异的基础上,调整自己的认知结构、心理状态与行为表现,以更好地克

服多元文化差异实现自身跨文化交流目的。提升认知性文化智商,能够使文化主体更善于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经济、政治及社会制度,从而更好地调整自身的跨文化行为。提升动机性文化智商,能够提高文化主体面对多元文化环境所带来的文化阻碍的心理承受能力,使其更具韧性。提升认知性和动机性文化智商能够增强文化主体的跨文化适应能力,使其在感知文化差异、克服文化阻碍中,更加从容、灵活地进行跨文化实践活动,从而在多元文化交流碰撞中保持自身文化的比较优势,提升文化自信的内在认同。

最后,提升文化智商能够强化主体的文化交流能力,在文明互鉴中厚植文化自信。“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16](P258)提升文化主体的文化智商,能够从多个层面提升文化主体在多元文化环境中交流、沟通的能力,进而较为有效地推动不同文化间交流实践活动的开展,为文化自信的形成提供契机。文化主体的文化智商的提升,使得中华文化能够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互鉴中,充分地汲取世界文明发展的先进经验与优秀成果,推动中华文明的永续发展,进一步深植文化自信的根基。文化主体作为文化传播的使者,其文化智商的提高能够有效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在异域文化环境中传扬中国声音、树立中国形象,在促进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国家与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的同时激发其内在的文化自信,使其能够以更为自信的心态、更为自信的行为向世界宣扬中国精神、传递中国价值。

(二)文化智商的提升能够为文化自信的激发提供心理支撑

首先,提升文化智商能够增强主体的文化自豪感。文化主体的文化自信形成,不仅来源于其在本民族文化科学审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更来自其在客观比较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似一面镜子,既能使文化主体意识到本民族文化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并通过批判借鉴异质文化的优秀成果加以完善,又能使文化主体充分了解本民族文化较之于其他文化显现出的优势,激发自身强烈的文化自信。提升文化主体的文化智商,能够使其更善于理解多元文化环境背景下的经济、政治及社会制度,更乐于比较不同文化间的异同,进而推动文化主体在文化交流互鉴中更好地认识与发展本民族文化,提升自身文化自信。文化主体在文化交流、碰撞与互鉴中形成的文化自豪感与文化自信,往往可以进一步激发文化主体动机性文化智商的提升,使其能够在自我效能感被不断满足的良性循环中,更为积极、从容地推动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进一步促进本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

其次,提升文化智商能够激发主体的文化包容性。随着世界各民族间交流、碰撞及互鉴进程的加快,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就愈发显现。文化主体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如何感知、理解与包容文化差异,逐渐成为困扰文化主体进行跨文化交流的首要问题。提升主体的元认知性文化智商,可以使其具有敏锐的文化感知力,及时捕捉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自觉调整自身的文化知识与行为方式,减少由文化间差异所带来的阻碍。文化主体在感知和理解不同文化间差异的基础上,能够充分认识到“不同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各有千秋,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17],进而形成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文化主体以包容性的文化心态看待不同特质的文化,往往可以较为从容、灵活地化解在与异质文化交流中所产生的文化冲突,在批判借鉴其他优秀文明成果的过程中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在坚定对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实现世界多元文化的共存共荣,保持中华文化经久不衰。

(三)文化智商的可测量性能够为文化自信的提升提供科学考量

文化自信既是文化主体对自身民族文化的理性认识,又是文化主体由内而外表现出的自信心与自豪感。作为一种心理认同,目前学术界尚未建立起科学有效的评测体系,以衡量文化主体的文化自信程度。而文化智商已具备科学的测量体系,一定程度上能够为文化主体的文化自信程度测量提供借鉴。洪信和戴文林等人不仅从样本选取、时间跨越、跨国普遍性、自我测评与同行测评相关性等角度验证了文化智商量表(CQS)的科学稳定性,而且从判别和增量有效性角度论证了文化智商在文化判别与决策(CIDM)、互动调节和心理健康方面超越了一般智商与情商。以文化智商指标作为考量文化主体自信程

度的依据,不仅可以使其了解自身应对多元文化环境的能力水平,有效地预估自己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成败,而且可以使其在全面了解自身跨文化能力水平的基础上,从中外文化认知、文化心理构建、文化行为实践等多角度有针对性地提升自身的文化自信水平。

四、提升文化智商以厚植文化自信的路径探究

文化智商理论不仅能够为文化主体的跨文化交流实践提供科学指南,而且能够为提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提供新的思路。以文化智商的提升来厚植文化自信,应着重从开展通识教育、完善心理构建和加强文明互鉴三个具体路径入手,提升精神性文化智商、动机性文化智商和行为性文化智商,进而厚植、激发和坚定文化主体的文化自信。

(一)开展通识教育提升精神性文化智商以涵养文化自信

通识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模式,其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已成为一种教育发展趋势。

首先,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识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历经数千年的发展与传承,作为文化自信的历史根源,凝结着世代中华儿女认识与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历史经验,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6](P15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承载的基本精神给国人带来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识教育,能够在涵养文化主体文化底蕴的同时,提升其认知性文化智商。不仅要向文化主体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象,更要让其理解光辉灿烂的文化成果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创造力与综合国力的体现。文化自信的本源性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源,因此,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形成本土认知的重要内容,能够促使文化主体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回顾中增进文化自豪感。文化主体形成的中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坚定了其对中华民族文化理想与文化价值的肯定,厚植了文化自信的“根”与“魂”。

其次,开展跨文化交流技能通识教育。文化主体在进行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不仅需要掌握语言、文化等认知性知识,还需学习跨文化交流的专门技巧以更有效地理解不同文化。文化主体在进行跨文化交流之前,应当参与相关的跨文化技巧通识教育的学习与训练,着重提升自身的跨文化移情能力、发散思维能力、跨文化协调能力以及灵活适应能力等,从多个角度对自身的跨文化交流技巧进行系统而全面的训练。文化自信的主体性表明,文化主体在改造其外部对象文化的同时亦改造其内心的主观世界。文化主体掌握较高的跨文化交流技能,不仅能够提升其改造文化的能力,更有策略性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而且能够在灵活处理文化冲突、克服文化差异的过程中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最后,开展中外文化比较通识教育。开展中外文化比较通识教育,不仅可以进一步增进文化主体对其他民族文化的了解,而且可以通过对中外文化的对比,更好地认识本民族文化,以形成文化比较优势。通过中外文化比较,能够提升文化主体的精神性文化智商,使其更乐于捕捉并理解中外文化之间的异同,更擅于在文化比较中认识与发展本民族文化。在此过程中,应当以中国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的发展为主线,引领学生思考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别,发掘中华文明较之其他文明得以源远流长、延绵不绝的根本原因。文化自信的指向性表明,文化主体的文化选择受其价值取向的驱使。文化主体在文化比较中对本民族文化形成全面认知与比较优势,使其更加认同符合自身价值指向的本民族文化,增强了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生命力与凝聚力的肯定。

(二)完善心理构建提升动机性文化智商以激发文化自信

提升动机性文化智商,是促进文化主体积极参与跨文化交流活动,推动中华文化不断发展,进而激发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完善文化主体的心理构建,旨在为文化主体在跨文化实践过程中提供良好的心理支撑,为激发主体文化自信提供动力。具体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提升文化主体的自我效能感。文化智商理论下的自我效能主要指个体进行跨文化交流时,对跨文化实践成败的心理预期。当个体成功进行跨文化交流实践的次数增多时,其自我效能感便会提升,个体会对跨文化交流更有信心。因

此,应当充分利用文化主体的跨文化实践活动,当其成功进行跨文化实践时,应适当地加以奖励,促使其自我效能得到充分满足;当其跨文化实践遭遇失败时,更应该及时对其进行心理疏导,降低其内心的负面影响,鼓励其继续保持跨文化交流实践的热情。另一方面,激发文化主体的内在成就动机。一般来说,个体具有两种成就动机,一种是金钱、奖品等外在的成就动机,一种是实现自身价值、追求卓越等内在的成就动机。相比较而言,内在成就动机往往比外在成就动机更为持久、更具塑造力。激发文化主体的内在成就动机,可以使其更为自发、自觉地学习与理解不同文化知识,更为主动地参加跨文化交流活动,提高其动机性文化智商。文化主体内在动机的形成,可以使其高效地完成跨文化交流实践任务,进而进入良性的心理循环,使文化主体在这一过程中能够不断形成正向的内在成就动机。文化自信的包容性表明,文化主体在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还应以开放、包容、大气的文化心态对待世界其他文化,形成“美人之美”的文化自觉,为文化自信的形成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动机性文化智商的提高,不仅可以激发文化自信的形成,还可以使文化主体在跨文化活动中更为得心应手地传扬与发展本民族文化。

(三)加强文明互鉴提升行为性文化智商以坚定文化自信

首先,创新文明互鉴形式。习近平指出:“锐意创新,用海内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18]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可以将实地线下交流与网络线上交流结合起来,为行为性文化智商的提升提供新的方式与平台。此外,还可通过丰富不同国家民间交流形式、增加各国不同层次文化交换生等途径,拓展文化交流互鉴的新渠道。文化自信的实践性表明,文化实践是文化自信形成的坚实基础。文化主体在形式多样的文化实践活动中,能够提高自身的行为性文化智商,更为灵活地应对跨文化交流活动的各种问题。在文明互鉴活动中,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创新创造能力,强化中华文化的吸引力与感召力,使文化主体对本民族文化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与期待。

其次,丰富文明互鉴实践。文明互鉴实践,是检验文化主体精神性文化智商和动机性文化智商水平的重要方式,是践行文化自信的实践途径。例如,文化主体可以借势“一带一路”倡议,丰富自身的文化智商行为实践,更多地参与到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之中。文化主体在丰富的跨文化交流实践过程中,不仅能够积累跨文化交流的经验提升其文化智商,而且能够在推动文化交流与文明碰撞的过程中增强其文化自信。文化主体在丰富的文明互鉴实践中,不仅能够认同本民族文化、理解不同民族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更能以包容互助的文化心态与构筑文明共同体的气魄推动“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境界的升华。在不断推动中华文化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实现文化自信更高层次的飞跃。

文化主体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自信的彰显者。文化自信只有在文化主体的实践中才能得以实现。文化主体如何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认识文化差异,并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中保持比较优势、坚定文化立场,是厚植文化自信过程中更为重要的、关乎未来的问题。文化智商作为全面衡量文化主体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探寻与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与本质特征,降低文化差异的阻碍以融入多元文化环境,进而更好地实现跨文化目标的能力指标,能够为新时期厚植文化自信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参考文献

- [1] 朱宗友. 中国文化自信解读.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7.
- [2]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8.
- [3] 蔡后奇, 洪晓楠. 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实践诠释学路径. 学习与探索, 2017, (11).
- [4]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光明日报, 2015-05-22.
- [5] 王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基. 山东社会科学, 2018, (2).
- [6] 刘松. 革命文化是文化自信的精神支柱. 山东社会科学, 2018, (2).
- [7] 大卫·利弗莫尔. 文化商引领未来. 王嗣俊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 [8] 布鲁克斯·彼得森. 文化智商. 张小海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8.
- [9] P. C. Earley, Soon Ang. Cultural Intelligence: Individual Interactions Across Cultur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 [10] P. C. Earley, E. Mosakowski. Cultural Intelligenc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04,(82).
- [11] David. C. Thomas. Domai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telligence: The Important of Mindfulness. *Group and Organization Management*,2006,(31).
- [12] Angela Chen. S. Y. CQ at Work and the Impact of Intercultural Training: An Empirical Test among Foreign Labor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2015,(7).
- [13] P. C. Earley, Soon Ang, Tan Joo Seng. CQ: Developing Cultural Intelligence at Work.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 [14] Linn Van Dyne, Soon Ang, Christine Koh.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CQS // *Handbook of Cultural Intelligence: Theory, Measurement, and Applications*, eds. Soon Ang and Linn Van Dyne. Armonk, NY: M. E. Sharpe,2008.
- [15] Lu M. Shannon, Thomas M. Begley. Antecedents of the Four-factor Model of Cultural Intelligence// *Handbook of Cultural Intelligence: Theory, Measurement, and Applications*, eds. Soon Ang and Linn Van Dyne. Armonk, NY: M. E. Sharpe,2008.
- [1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17] 习近平. 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人民网,2014-09-24.[2018-06-24]<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5729647>.
- [18] 关于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 30 周年的重要批示.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05-22.

CQ: A New Perspective of Cultivating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Wang Jia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CQ is an index to measure the ability of cultural subjects to adapt to and integrate into multicultural environment. The promotion of CQ can perfect the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ultural subject, improve the ability of the cultural subject from many aspects, and further upgrade and predict the level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eventually promote th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from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to cultural practice. In order to cultivat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with the promotion of CQ, the general education,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 perfection, and mutual learning of civilization consolidation can be adopted to respectively promote spiritual CQ, motivational CQ, and behavioral CQ, and further to cultivate, inspire, and firm th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of the cultural subject.

Key words cultural quotient(CQ); cultural confidenc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收稿日期 2018-07-12

■ 作者简介 王 嘉, 法学博士, 大连理工大学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辽宁 大连 116024。

■ 责任编辑 涂文迁